

對民主之仇：論一種「非分之分」的恐怖政治

Ferocious Hatred of Democracy:
The “Part of non part” Terrorist Politics

梁廷毓

Liang Ting-Yu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美術學系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摘要：本文主要是對當代法國思想家賈克·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政治哲學思想的梳理，從洪席耶對「政治」（politics）與「治安」（police）的區辨，以及在其「無分之分」（part of no part）的基礎上，提出「非分之分」（part of non part）的問題與爭議。意指那些在共同體內部被壓抑，又處於「無分之分」外部的一些無法被代言的聲音。接著以當前歐洲內部興起的恐怖攻擊為引，反思洪席耶政治哲學思想中政治、民主論述的盲域與界限。

關鍵字：政治、治安、無分之分、非分之分

Abstract: This paper is mainly about contemporary French thinker Jacques Rancière's political thoughts are sorted out from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politics" and "police" by Jacques Rancière, as well as his "part of no part". On this basis, further raise the issue and controversy of "part of non part". It means those voices that are suppressed within the community and are in "part of non part" that cannot be endorsed. Then take the current terrorist attacks in Europe as a case to reflect on Jacques Rancière the blind domain and boundary of politics and democracy in political philosophy.

Keywords : politics, police, part of no part, part of non part

壹、政治的本性

賈克·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賦予「人民」（people／peuple）一種動態的意涵，並側重於揭露民主政體內在的不確定性與弔詭。這很大程度的來自於對「政治」的發生及其勢態的思辨。或者更精確地說，是一種對於「政治」如何維繫在一種弔詭、矛盾與疑難的恐怖狀態之追究。

這意味著在賈克·洪席耶的政治思想中，認為政治並沒有解決問題的能力，也無法單獨通過自身來解決外於政治的一切問題，政治總是維持在一種疑難與衝突的時刻裡面。以此而言，政治不會被各種的議題、任何的道德判准所綁架。它甚至無關意識形態和價值，所訴諸的亦不是改變社會（只是其附帶的作用）。儘管對某些價值的追求會訴諸政治手段，但是「政治」從根本上與任何的信念毫無瓜葛；另一方面，政治就其特性而言，是罕見的，它永遠是在地與偶然的（Politics, in its specificity, is rare. It is always local and occasional.）（洪席耶，2011〔1999〕：288）。沒有一種逆勢的衝撞，政治就無法成為政治，甚至在衝突與非法之外，絕無政治（Rancière, 2009：668）。

一般而言，主權國家一直是建立在「博愛—恐怖」（la fraternité-terreur）的邏輯中，即在挑選誰是人民並成為同群的同時，也在辨識並排除誰不是人民、誰是異者（洪世謙，2017：168）。從而建立起具有內在性、封閉性，以抹除個體差異，將所有人置入一套強調制度、界線與秩序之中的「共同體」（community／communauté）。一旦人民以整體的方式被命名，並納入共同體的時候，就會出現「無份之分」（part of no part／part des sans-part），而這樣的群體，是將社會組成部份進行化約的結果。

共同體內部雖然共享著同質的話語（logos），但是當特定屬性被政治理性與權力結構，定義為構成共同體的原則，那麼不被納入計算理

性範疇的屬性。例如，不同語言、血緣、種族的人，便成為無法參與的分子。而屬於「無分之分」的這些不被計算的無分者，包括不斷勞動而無財產的無產者、沒有公民權的外地人、移民、移工(劉紀蕙 2020: 307-308)；這群人既是喬治·阿岡本(Giorgio Agamben)筆下那些可以被殺害而無違法之虞的「牲人」(homo sacer)；亦是洪席耶筆下的那種被「棄置於靜默長夜，或將他們認定為僅是表達愉悅與痛苦的動物喧囂，而得以進行象徵化」的畜牲(Rancière, 2011 [1995]: 51)。作為被遮蔽、排除與掩蓋的部分，可見者和不可見者的區分就在於是否具有話語能力。這些「無分之分」是被標記為低賤的無法言說者，他們甚至被貶斥為禽獸，是那些只能作為不被算入者而被納入之失語的群體。

另一方面，以往被視為「無份之份」者，是在治安邏輯中容易造成混亂而必須被排除之人。對洪席耶而言，治安(police)有別於政治(la politique/politics)。是一整套連結了社會機制與法律所形成的保安系統，警察僅是「治安」的一種形式。實際上「治安」更偏向於一套秩序之內的話語代理者之角色。因此，在治安邏輯的「感性分享」(le partage du sensible/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之下，共同體中的一切，都面對著接納與排除的對立命運：被劃分為可見與不可見、可聽與不可聽、話語與噪音，並將現實的不平等投入到分配與正當化的秩序之中。換言之，「治安」建立在一種計算之上。這種計算說明了誰是有權享有自由、權利之人；這種計算決定了誰是共同體、誰是人民；也是在這種計算當中，定義了甚麼是平等與正義。而造成了某些人必然被排除在外，成為「無分之分」。

相反的，「政治」則開始於對「治安」的否定，是「對治安秩序的不諧和擾動」(蔣洪生，2012: 98)，指稱打破既有的感知分配，並算入無分者的一份之罕見的時刻。因此，政治永遠發生在那些被視為沒有聲音或噪音的「無分之分」，當這些無分者藉由抵制性行動而出現，使得原本穩定的計算邏輯產生中斷、扭轉或錯誤，造成話語邏輯的斷裂，就是政治的起點。而透過重算或錯算，打亂計算的分配方式，也為政治主體的形構開啟一個可能的空間(Rancière, 2005: 142-143)。

貳、治安與政治：衝突性的共生

對洪席耶而言，沒有一種治安邏輯不會錯算（*miscount/mécompte*），或不會製造某種「錯誤」（*le tort/the wrong*）。其中，「錯誤」是一種衝突，是在不被算入（不算數）的言說能力，和被算入（算數）的言說能力（政治能力）之間的衝突。而「無分者」的主體化過程實際上是一個暴露「錯誤」的過程，並且定義出一個錯誤的主體：因為「無分者」原本應該屬於一個不被計算的部分，而這種主體化的過程把「無分者」納入了計算範圍，就是一種過錯。而當無分者得以因此出現和言說時，即是政治性主體產生的時刻。換言之，「政治」並不是在國家或代議制民主的計數規則下，進行不同意見的協商。而是「無分者」以「錯誤之名」對於所認同的共同體進行其原有話語邏輯的中斷，藉由改變分配秩序的行動，讓那些根本沒有被體制規則所代表的群體獲得言說的時刻。

此處的「政治」必然出現在對於統治者所設下的界線之跨越（*overstep*，一種有限度的越界）的瞬間，而界線僅能藉由跨越的瞬間才會變得可見，並隨即因為下一道不可見的界線的更新、或是回歸到體制當中而立即消失。這種政治主體總是短暫的，往往隨著特定的事件閃現與覆滅。因為，一旦在體制內獲得言說的位置，那便會再一次地重新回到「治安」的秩序邏輯。換言之，「政治」必然與某種革命有關，但是如果進入到奪權的階段，就伴隨著維護那些由權力架構出來的制度，而讓「政治」徹底的消失（奪權因而是一種反革命與反政治的活動）。

從不被計算到出現計算錯誤，僅會形成兩個結果：一是「打破既有言說位置的分配秩序之後被算入」，所面臨的是還是必須回到這個重新被調整過的話語邏輯的計算之中（取得話語權），進而再次出現新的權力部署和錯誤計算；二是「暫時性的打破既有言說位置的分配秩序之後，再次被排除」，所面臨的是重新回到失語者與無分者的位置，並讓原有的話語邏輯意識到這個破口。

另一方面，如果「治安」是一種在共同體內部進行位置與角色的分配，並正當化這一分配系統，而「政治」是必須要打破「治安」的

次序分配邏輯，讓原本無法被看見，無法被感知的東西得以呈現之物。那麼，似乎共同體所能長久運行的內在動力，恰恰就是「治安」與「政治」彼此所構成的一種「衝突性的共生」(mutualism)或「片利共生」(commensalism)的秩序。這些被排除的無話語者，反倒更屬於治安的範疇，而這種政治時刻反倒在其消失之後更加穩固治安的邏輯，這即阿岡本所謂的「納入性排除」(inclusive exclusion)的結構。甚至，上述的兩個結果，可能是統治者與無分者之間，一開始便各自計算與盤算之下的預期結果。

例如，珊妲·慕孚(Chantal Mouffe)致力於將「敵對」(antagonism，一種雙方毫無對話基礎的敵人)轉化為「抗爭」(agonism，形成衝突性的共識)，讓「反對者」出現並取代「敵人」的角色(Mouffe, 2016 [2005]：49)。這種對民主運作的持續性活力的期待，訴求不斷的談判與協商(negotiation)的衝突性關係，也可能導向一種共生的危險。換言之，諸如體制內的改革、申請合法場地的和平示威，可能都是謀求治安的活動；而體制外的抗爭，則被反過來成為一種修補性、可納入性的行動。意味著所有的排除都是以被納入的形式被排除，所有政治時刻的出現與消失都會以指出「錯誤」的方式來修復原有的破口。

進一步的，這些「無分者」以抵制、抗議行動來中斷原本共同體的話語邏輯，並不是從根本上的進行重置(reset，即進行重啟與重新設定計算的程序)。即便在產生中斷效果之後，無論是順利的「被算入」或是「再次被排除」，都是一種變相的替原來的話語邏輯進行更新、或是找到修正的機會。換言之，無分者讓計算「錯誤」現形，意味著讓「錯誤」有著被持續更正的可能，統治者將會藉由這樣不斷地的自我修正、改良秩序分配與治理的技術。甚而這一種中斷的效果，在當代的民主政體或民主國家裡面是修正性質的。

如果共識的本質，並非由與衝突或暴力相對的和平討論與理性同意構成。相對的，共識的本質在於廢除與自身感知相分離的異識。於是，共識即存在於由政治到治安的化約之中(Rancière, 2010：42)。換言之，共識即是政治的終結(end)，並且致力於將人民化簡為人口，將政治化約為治安的方式。因為，這總是形成一種「納入性排除」，並拒絕採納特定的言說或聲音。上述「衝突性的共生」未曾脫離洪席耶

對「共識」的批評範圍，這之中所產生政治時刻，意味著一種更為生態性、關係性的計算邏輯的運作，是統治者去計算如何以一些不定期的短暫的中斷，反過來去完備統治技術與分配秩序的手段。

參、非分之分：徹底離開「無分之分」的政治¹

「無分者」與「有分者」之間雖然很難有共識（consensus），但是維持某種共生的關係。若共識是「政治」的結束，那麼這種被忽略的共生關係，則是從根本上將政治化約為僅有在「無分之分」這裡才可能存在的東西。更重要的是，忽視了拒絕、不想進入、徹底離開原屬共同體，卻想取得發言位置的那個矛盾的「部分」。

如果存在一種可以徹底離開「無分之分」的政治，會產生於何種層面？筆者認為，是發生於統治者無法藉由「無分者」去造成錯誤或中斷的計算與盤算之外的那個部分：在「有分」與「無分之分」之外的「非分之分」（part of non part）²。若「無分之分」所形成的錯誤可以被更正；中斷可以被重新銜接；扭轉可以被倒轉，偏差可以被修正。那麼「非分之分」的出現，則創造了一種無法挽回的錯誤。這種錯誤的出現是毀滅性，因為它首先是對共同體的否定而非認同，並以否定它的方式參與其中。儘管「非分之分」被共同體內部掌握話語分配秩序的人們，認定是「無分之分」的變體（variants）。但弔詭之處在於，並非是無分者以「錯誤之名」對於所認同的共同體進行其原有話語邏

¹ 目前關於恐怖主義的論述，大多從國際關係、政治社會學與政治歷史學的角度進行探究，鮮少從政治哲學的角度進行思辨與對話。本文即是從這個方向切入相關問題的推進與探討。

² 洪席耶所探討的「政治」，其實都是民主政體內在的「不確定性與弔詭」、「衝突懸疑」與「決斷」現象之總和，然而一旦分析場域換到「恐怖分子」，整個的定義與解析可能需要修正。就必定跳脫洪席耶原本對政治的定義而歸趨於 *raison d'état*（reason of state）的範疇，在此之中並無 part 或 no part（此為確定政治疆域與界線內才有的概念與思考方式），而是由赤裸的權力邏輯與國家利益所決定的 non-part。在 no 與 non 這兩個否定副詞的區別上，non-part 是指向「有分／無分（part／no part）」這組二元框架的徹底反面之部分。

輯的中斷，並在改變分配秩序的行動中尋求言說的位置。相反的，「非分者」會對所欲挑戰的話語邏輯拋出「誓言」(oath)，以不對話、不現身、匿名（作為非人民的「無名之名」，不是作為「空名」的人民）的方式出現。以自己與任何一位無差別的生命來擔保，在既有的「有分」與「無分之分」之間，劇烈地置入自己的發言位置。

對洪席耶而言，「政治」只發生在共同體當中第一人稱與第三人稱之間的爭議，並藉由「述行話語」與第三人稱形成歧義的理性（洪席耶在此不用logos一詞）。宣稱自己為無分的行動者們、以不被計算為前提來進行爭議，使原本被排除的「無分之分」透過抵制原先的不平等與差異的配置，擾亂原先的感知分配體制。例如，「誓言」作為一種特殊的語言形式，不是某種價值與意識形態立場的宣告或是公開聲明，它首先是代表某種生命進行決斷時的「述行話語」(performative utterance)，因而它絕對不容置疑，在本質上必須是一種有效性的保證。

然而，「恐怖份子」³作為在「非分之分」當中的一種「誓言」的具現化形式，是在面對統治者時，發起不對稱衝突當中的「非分者」，必須以終結自身與他人的生命，來創造一個暫時性的、靜默無語的發言位置，形成統治者所無法忽視的噪音，在手段上與「無分者」索求發聲話語的行動有所差異。在此，誓言與歧義（*mésentente / disagreement*，即洪席耶所認為的政治條件）之間雖然共享著一種瞬間性、暫時性的強度時刻，但卻在計算的層面上有所差異：此處的「政治」伴隨的是對於非理性行動的無法計算，而非錯誤計算（必須注意的是，計算並不存在失效或失能的問題，因為永遠處於一個持續修正的程序當中）。所以，無法計算即是對統治者始終無法進行準確計算、持續無法估算——藉由人類心理的非理性部分（例如，怨憎及恐懼），造成話語邏輯運作的恆常無法計算。

對洪席耶而言，「分享」(*partage / parta*)同時意味著分離和參與，而所謂的「感性分享」同時確定著某種被分享的共同狀態及其專屬部

³ 事實上，恐怖分子大多並不侷限於共同體，來自外部、跨國的恐怖分子也稱不上是共同體的一部分。因此，必須注意的是，本文對於恐怖份子的論述框限在共同體中，亦即，侷限在歐洲各國國內的恐主義之中，否則筆者所提的「非分之分」便會失去意義。

分，並定義著其相對應的位置與部分的裁切，讓人們能在此過程中成看見感性證據體系，是以往依據原有的共同體去計算與配置結果。換言之，這是一種對共同事物的存在和其中所定義的地方與相關部分的劃分，並同時建立了共享和排除的部分（Rancière 2004：12）。然而，「非分之分」讓原來在此共同體之下的一個被計算、並以此計算部分來參與共同體的部份，以及在共同體之內處於被劃分與分配的部分，因為它的出現而重新被改變。例如，恐怖活動之目的在於刻意激起國家的暴力攻擊，而因為國家往往會合理化自身的血腥報復，反而能夠作為恐怖份子發動下一次恐怖活動的合理藉口，並連帶的博取民眾同情甚至加入（Guibernau, 2009：186-187）成為「非分之分」。

換言之，「非分之分」形成的錯誤，不是傷亡，亦非破壞本身，它甚至從不關注治安，也不關心權力的生產方式。而是使那個話語邏輯產生運轉上的例外、無法計算，最終如何形成將共同體牽引到未知的恐懼深淵，或是重新劃分出新的、屬於「非分之分」這一塊的群體，以此達到感知的重新分享的第一步條件。接著，因為政府和恐怖組織之間報復與反報復的結果是恐怖的不斷升級。反過來讓政府無法將它劃入無分者，亦不能使其成為有分者的窘境，並陷入一種話語邏輯本身的例外狀態（而不是指可以隨意處置「無分者」的法律例外狀態）以及計算持續失準（因為牽動到對於未來組成部分的計算）的危機。為了穩定局勢而採取對恐怖份子進行鎮壓行動，反而使恐怖分子再進行多一次的恐怖行為，週而復始地維持一種不定期性、高強度政治的生產。

而更重要矛盾，是在擁護公民自由價值的民主政體當中，比起其他政權採納更高的道德標準，在這種國家裡發生恐怖活動會使之陷入兩難：一種是維持其公民自由但可能被認為無力應對這種問題；另一種是強力限制公民自由但違背其支持公民自由的主張（Yager, 2010：Belfast Telegraph Web）。使民主政體陷入計算失準與話語邏輯的矛盾，形成推往感性重新分享的第二項條件。

肆、幻聲—無言的話語

必須注意的是，洪席耶對「民主」有一種社會主義式的關懷，認為「民主」不是透過一個空的人民的概念而出現（例如，預設著同質性人民的存在，進而對不同人群進行代表或代議）；而是透過個體匯聚成集體行動的抗爭而產生，這種民主的力量是要透過無分之分顯現出的政治時刻來彰顯。但是，這也可能形成無分者與有分者之間關係的激進化。

事實上，洪席耶曾指出這種力量既可以通過讓激進伊斯蘭主義者以實行恐怖主義的方式，反對將民主等同於寡頭法則下的國家；也能夠在世俗民主的名義下支持寡頭國家對這種恐怖主義進行開戰。無論是以《可蘭經》的名義摧毀民主；或是將民主的戰爭擴張等同於對《摩西十誡》的執行。所有這些現象，至少都迫使我們重新找回特定於真正「民主」的特異力量（洪席耶，2016〔2006〕：101）。換言之，對洪席耶而言，恐怖攻擊事件是某種「無分之分」的創造，或是對既有治安邏輯的突破。然而，洪席耶並沒有將恐怖主義視為一種持續性、常態化的方式來理解，也沒有考慮到恐怖份子在共同體內外進行對抗時的動態整體（dynamicwholes）之關係，仍然將之置放在一種政治時刻出現的偶然性之中。

這也是筆者為何提出「非分之分」進行某種修正與商榷之原因。因為「非分之分」往往會進一步的挾持自身無法被算入的宿命與極力在其否定的共同體內部創造發言位置的極端行動。甚至逼使國家化作一頭去除掉「利維坦」（Leviathan，霍布斯所隱喻的國家機器）身軀的、實質意義上的巨獸——激起統治者的生物性，不遵循治安的邏輯，誘使國家捲入「非分之分」所設定好的以命償命的非理性、報復性的反社會人格。例如，2011年，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副總統拜登（Joe Biden）、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Clinton）以及國安會成員聚集在白宮戰情室，專心注視著奧薩瑪·賓·拉登（Osama bin Laden）⁴

⁴ 賓·拉登在1988年左右成立了蓋達組織（Al-Qaeda）後，與其他恐怖主義組織合作，開始在中東之外招收成員，成員分布和來自於東南亞、非洲、歐洲和美國，參見（左冷禪，2020：每日頭條）。

於巴基斯坦家中被美軍狙殺之過程，讓這張照片中的「人」化為動物注視著電視另一端的動物，前所未有的注視著眼前的獵物，暫時性的中斷「人」與動物所區別出的理性話語。

事後，有些「人」認為美國的統治高層選擇「狙殺」奧薩瑪·賓·拉登的決定，是不理會法律和道德方面的殺戮行動，特別是對於「為何不活捉手無寸鐵的賓·拉登而將其擊斃」的質疑。例如，曾於紐倫堡審判擔任首席檢察官之一的班傑明·費倫茨（Benjamin B. Ferencz）對於擊斃賓·拉登其合法性提出了質疑，他提到：「更好的方法是抓住賓·拉登，並將他送上法庭審判……對於殺害一名試圖自我保護但不會造成直接威脅的人來說，無論根據軍事法還是所有相關的法律條文都是視為犯罪行為」（Lewis, 2011：BBC News Web）。

又如法律學者傑弗里·羅伯特森（Geoffrey Robertson）指出的，擊斃賓·拉登一事可能意味著破壞了「法治」（即自我破壞掉「治安」的一的部分），原因在於「安全理事會可以在海牙成立一個由多名國際法官（包括穆斯林法學家）組成的特設法庭，藉此提供一個公正合理的審判與判決（Robertson, 2011：THE HILL Web）。換言之，羅伯特森也指出國家在此自行中斷了治安邏輯。在此，面臨到的疑難是：當「人」自我中斷人之所以為人的話語條件，是否也存在一種政治的潛能？如果說，動物性是人性的反面，是被人性所否定之物，是從人這裡所驅逐出的一個概念。那麼統治者在面對「非分者」時，重拾了動物性，究竟意味著甚麼？

若洪席耶的「無分者」（sans parts）是由計算與分配的問題所衍生而來，「非分者」似乎處在分配之外，更接近一種「非本分應有」（比如「非分之財」或「非法之徒」的狀態），必須放置在某種擴大的逾越（transgression）律法之思辨中，脫離了傳統的政治學論域。喬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在討論暴力與踰越時指出，即使動物之間的相互打鬥也很少置對方於死地，在智人與動物彼此無分別的原始時代，智人似乎還不懂得殺害同類（Bataille, 1957 [2012]：127）。言下之意是：正是因為「人」掌握話語，而與動物區分開來之時，才懂得殺人。並且，正是基於對死亡的覺察，而將掌握話語的「人」拋向了動物性。

而「非分者」在統治者身上所逼顯出的內在矛盾與張力，正在於

揭露人的政治性其實是以生物性為輔助的運作。而這種壓抑著生物性卻又因為面對「非分者」而暴露其生物本性的「政治性動物」，造成體制內部的話語邏輯運作的懸置（suspension），所浮現出的政治潛能本身，是一種非政治。「非政治」並不意味著政治的缺席，而是一種將臨而未臨的政治。使其被迫處於一種高壓拉張的自我矛盾與無法修正的話語邏輯錯亂的緊張關係之中。而這種「非政治」並不訴求抗爭，恐怖攻擊僅是表象，以否定共同體的方式參與其中，將共同體捲入一種恐懼之中才是其關鍵。

另一方面，統治者在將「非分者」動物化的同時，亦同步啟動著另一種將臨而未臨的政治。例如，唐納德·川普（Donald John Trump）在宣布擊斃的恐怖份子貝克爾·巴格達迪（Abu Bakr al-Baghdadi）時，稱對方「死得像條狗」（He died like a dog.），實則支持了下一次恐怖行動的合理性。因為「非分之分」並不是可以被共同體所算計、劃分與配置的「無分之分」，因此在將「非分者」排拒為畜生的同時，就已經啟動「非分之分」所內建的那種招喚政治再次將臨的條件。恰巧成為激起又一次的、無可計算的政治時刻的誕生：每一次國家進行的報復性行動都預告著下一次的恐怖行動的契機。每一次國家宣稱為合理的報復行動都弔詭的論示著下一次恐怖行動的合理性。換言之，這是一種作為潛能的「非政治」，即一種政治的無盡後延（aftermath effect）力道，不是存在於表面擴散性的影響上，而是嵌入進「非分者」所設定的政治本身的觸發條件，每一次的政治時刻都內建著下一次政治的臨來。「非分者」將再次以無法一種被預估的形式發言，將統治者捲入一個永無輪迴的、弔詭的報復機制之中。

「非分之分」與「無分之分」的差異之處在於：一方面，「非分之分」並不像「無分之分」在關於共同體組成部分的計算，總是會牽涉到某種錯誤的計算。「非分者」以否定共同體的方式所參與其中的那個部分，所直接導致的是從根本上就無法被計算的結果。另一方面，相對於「無分之分」必須對於話語邏輯產生中斷和錯誤計算，來將噪音晉升為話語，以尋求發言位置的欲求。「非分之分」是以無法被計算、也拒絕被算入的方式來創造發言的位置，始終沒有要讓噪音成為的話語。而迫使國家以一種例外、創造特例的方式面對他們所發出的噪音。

若不進行「減噪」、或是將其納入正面解決問題的對象，噪音將會再次產生不可預測的影響。

近年的恐怖攻擊事件後，大多有主事者高調承認，並藉機宣揚其教義，這似乎是一種在共同體之外的語言行動。一方面，「非分之分」並非是處於特定極權國家或特定殖民時期的叛民，以及以野蠻手段對抗統治者的一種過時的存在。九一一事件（September 11 attacks）⁵作為一種當代的典範性的「誓言」形式，其中死亡的 2,996 人根本不是重點，墜毀四架飛機、崩塌了的世界貿易中心雙峰塔也不會中斷共同體的話語邏輯，這些外在的物理性傷害，都不是造成「無法忽視的噪音」被國家所面對的關鍵。而是國家突然聽到一種差異於以往噪音的「無源聲」（acousmatic voices）⁶的聲音，聽不懂卻無法不聽、亦無法排除。而這種只能聽取其「聲」卻無法計算其「份額」的性質（亦無法以不算入的方式將其算入），從而也開啟了話語邏輯往後在無法計算與失算之間的一種動態的緊張關係。

另一方面，「無分之分」與「非分之分」毫無疑問的都是國家或共同體所認為的「無話語能力的動物」。兩者所發出的亦毫無疑問是某種「畜生的聲音」。但是自「非分之分」從十八世紀出現以降，這種特異

⁵ 在《911 事件調查報告》文件中名為的「延續行動」(Operation Encore) 裡，描述一位男子歐瑪爾（Omar al-Bayoumi），試圖協助 2 位蓋達組織成員哈茲米（Nawaf al-Hazmi）以及米海爾（Khalid al-Mihdhar）策畫劫機一事，透過對話可得知，蓋達組織在美國境內得到了同夥的幫助，參見（張守達，2021：Mirror Media）。美國政府在事件發生後立即秘密拘留、逮捕、盤問至少 1200 人，大多數是境內非美國公民的阿拉伯或穆斯林男子。美國司法部也查問 5000 名來自中東的男子。而在 911 事件之後的美國本土恐怖攻擊，襲擊者大多是美國公民或合法居民，恐怖分子已經「本土化」。稱之本土恐怖主義（homegrown terrorism）或境內恐怖主義（domestic terrorism），參見（Abu Khawla, 2010：American Thinker）。

⁶ acousmatic 這個詞來自法語 acousmatique，源自希臘詞語 akousmatikoi（ἄκουσματικοί），法國哲學家米歇爾·希翁（Michel Chion）用以指稱那些聽到的、但未見到發聲來源的聲音，參見 Michel Chion, 1994：29-32）。此處筆者挪用此一概念來指稱「非分之分」之於所產生國家的「幻聲」。

「份額」的存在，甚至讓亞里斯多德（Aristotle）的斷言「人是政治的動物」（Man is by nature a political animal.）某種程度上徹底的失效了。

「非分之分」仍然坐落在這組區分（人與動物）裡面，並且，正是因為這種區分才啟動了「非分之分」的政治潛能。恐怖分子作為一種「誓言」的形式，使噪音離開了噪音自身，在無法捕捉之處成為了「幻聲」（auditory hallucination）——成為統治者聽到的那個「無言的話語」。

另一方面，既然「非分之分」的行動根基在於「以否定共同體的方式所參與其中的那個部分」，那麼作為溝通的話語便已不再是重點。因為「非分者」一旦誕生，其所挾持的「無言的話語」，不是讓共同體不復存在，就是即將被摧毀。換言之，「無言的話語」與「殘響」（reverberation）無關，「殘響」是屬於「無分之分」試圖進行發言的一種聲音形式。⁷「無言的話語」之所以被聽見，是因為讓國家憶起自身的原初經驗：「非分之分」永遠無法藉由政治行動成為共同體的一部分，因為「非分之分」一旦被算入就等同於是對計算邏輯的顛覆，取得發言位置就等同於某個共同體的末日；因為「非分之分」不會成為本來那個部分的一份子，而是徹底的篡奪與置換——每一個政權都是從暴力起家的這一宿命。

所有政權都有其暴力的過去及根源（英國的清教徒革命、美國獨立革命、法國大革命皆不例外）⁸，讓「無法不聽的噪音」成為迴盪在國家自身的「無言的話語」。直言之，「非分之分」亦是內在於國家及其共同體內部所壓抑的部分，而不是從外在排除的「無分之分」。即便

⁷「殘響」是指來自多種不同音源的回音，混合在一起的聲場，具有某種聲音減弱之後的後延效應與迴盪作用。在孫松榮與林志明等學者的評述中，「殘響」常用以共同體範圍之內的反迫遷、反威權、反開發的社會運動結束之後，具有抵抗後延性之藝術與異議行動。參見（林志明，2016/02/06）；（孫松榮，2016：105-148）。

⁸ 必須注意的是，筆者無意混淆了極端伊斯蘭教派在歐美所引發的恐怖活動與在自身國家展開革命的區別。而是要強調，無論是英國清教徒革命，美國獨立革命與法國大革命，或是當今的歐州的西亞裔移民第二代，這些現實政治的例子中，在社會脈絡、政治意義、行動本質與內涵差別雖大，但其共同的特質在於都曾遭遇到「無分之分／非分之分」的根本性劃分。

國家始終不會、也不可能算入「非分之分」，「非分者」都有機會能站在一個弔詭的發言位置，佔據一種永遠不可能成為它所否定的那個部份中的一個部分。使得政治的時刻，以這種弔詭的翻轉，使噪音流變為「無言的話語」（而不是重新決定誰是話語或噪音），成為介入到話語邏輯之中無法分割離析的「幻聲」。

國家起源於暴力，卻將暴力視為禁忌這一矛盾，恰恰是藉由恐怖份子對於這種禁令的踰越，才更加以鞏固這種矛盾。因此當「非分者」以一種非人的極端形式出現，通過「誓言」來產生一種「無言的話語」，藉由上述兩種「非政治」來中斷統治者的話語邏輯來進行感知的重分配。並使統治者無法藉由每次的中斷，進行後續的修正或修補，亦無法進行預期。這也使得這種雙重的時間意義下「非政治」（一種是從內在去造成話語邏輯本身的中斷機制，一種是由外在啟動的永無輪迴的復仇機制）因而不會被消除或消失，反而構成了政治的潛能本身，使掌握話語的人必須直面這種由「誓言」所引爆的「無言的話語」。另一方面，將國家捲入「非分之分」所內建好的一種以暴制暴、以命償命的復仇性機制，在既有的共同體內部，不斷地透過誰是「非分者」的標記，再度強化了這套無止盡的復仇機制。並可能使統治者將「反恐行動」定調為將是永不休止——在治安邏輯裡面，永無可被劃入計算的未知時間之中。

這種交繞在「無言的話語」與「話語」之間展開政治分子化的運動，在這個靜默的對話之中，蘊含著雙重的不可共量、雙層的不可翻譯性，也是語言的潛能與無能共存卻不共容的張裂時刻。並且，根本性地構成了實現「政治」的先決條件。而恐怖行動某種程度上以另一種方式重新區分了「話語和聲音的劃分邏輯」背後的那個計算邏輯本身的幾種計算方式（在原本的排除與算入之外，讓我意識到徹底無法被算入與持續性計算失準），並重新分配一種「政治的恐怖」（the horror of politics）與「仇恨的政治潛能」之複雜感知。

伍、一種沒有代理者的發言

歷史上，人們運用各種組成方式來設想共同體——雅典城邦、羅馬共和、封建王朝、民族國家、民主共和國、共產社會國家、歐洲聯盟等。但是，如果上述只是通過某些秩序、共識、互利與協商而組成，那並不是一種可能與政治聯繫的「政治共同體」。所謂的「政治共同體」是一個中斷的共同體，一個破裂、零星和局部的共同體，透過這些中斷、破裂……平等邏輯將治安邏輯自其本身分裂（Rancière, 2011 [1995]: 226）。換言之，一個政治的連結要確實被建立起來：並非基於對受害者乃至於受害原因的認同，而是加害者對於受害事件中受害者身分與數字的掩蓋。

無論是以追求民主為目標而不得不為的暴力抗爭；或是追求極端共產社會理想的暗殺行動、武裝抗爭；還是反對民主制度，想要重返專制獨裁的政治運動，都可能出現某種可以被視為是政治的時刻。在過去，人們曾經懷抱著各種「想像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的想像，讓·呂克·南希（Jean-Luc Nancy）曾斷言，這是一個眾多死者的共同體（Nancy, 2016 [1986]: 28）。完成自我犧牲的壯舉，想像著自己的犧牲或集體的赴義，能夠將自己的死亡封存於各種主義或正義之中，也就是想像藉著自我犧牲而令自己的死亡獲得辯證地否定（不死）／保存（宛在）／提升（垂範）（朱元鴻，2004：194）。與其認為「非分者」所要求的恐怖活動，已經不再是共同體的問題，不如說「非分者」正是經由繞經共同體的內部而犧牲死亡——最後滋長出的「非分之分」。

而屬於「非分之分」的群體，則選擇徹底離開了原屬的共同體中的「無分之分」，選擇每一個人都具有平等且自主的選擇權可以參與的「非分之分」。並以否定原屬共同體、背叛原屬共同體的方式朝向赴死之路。這群人「在歐洲出生，大多歷經青年失業、就業歧視、貧窮、無法融入歐洲主流社會。多半是移民第二代，從小接受歐洲教育薰陶，卻感到在政治、經濟與社會遭受歧視，也不乏有為反對社會不公正而參與者」（江今葉，2014：CNA 中央通訊社）。換言之，此種徹底離開「無分者」的政治，即是離開所屬的共同體，到他處尋找發言的位置。

這就是為甚麼，歐洲境內在 2010 年代出現越來越多本地的恐怖份子（根據歐洲聯盟所公告的統計，截至 2016 年為止，約有 3,922 至到 4,294 名歐洲人成為潛在恐怖份子「聖戰士」，其中以法國、德國、英國以及比利時為最大宗）（Bérénice Boutin, 2016：03），但政府卻遲遲無法完全有效地掌握具體數目與潛在風險之原因。

這已經不是歷史上的「伊斯蘭文明」與「基督教文明」之間跨國界、跨洲際、跨地域文化的邊界衝突（例如，1095 年至 1291 年之間的十字軍東征）。而是在歐美民主國家所組成的共同體的核心區域——政經首都圈（紐約、巴黎、布魯塞爾等地）進行內爆。換言之，這已經不是國界內／外的邊界衝突問題，亦不止是「文明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的問題，而是在共同體內部生成，卻無法完全藉由風險預測和超前部屬來徹底遏止的群體。然而，目前「非分之分」所能實現的不是權力與權利的平等，也不是文化多元主義下的假性平權（這只會重蹈共同體的計算邏輯），而是一種根本上的「思想的平等」：即使能在肉體上消滅其生命，亦很難在思想上將其進行納入，因為極端政治信仰間的不相容，使兩股力量在精神性層次永久的持平。但弔詭的是，這往往伴隨著將任何人拖入生命不平等的窘境。因此，在實質平等的理想與結果上，恐怖行動注定失敗。但是放在政治強度的展現上，卻閃現一種沒有代理者之發言的瞬間。

更精確的說，「非分之分」藉由無法被計算所形成的計算錯誤是兩個方面的：一方面，擾動共同體內部對既有分配聲音／話語的秩序，驅使無分者可能加入「非分之分」，尋求「誓言—統治者無法忽視的噪音—幻聲—無言的話語」的無形位置，使其產生民主政體的矛盾、復仇的迴圈。另一方面，藉由身分、認同的衝突，受壓迫與歧視的處境，以「誓言」的形式，揭開對於同一種「自由」與「正義」的各自合理化的強烈爭端。除了擾動對既有分配聲音／話語的秩序，也揭露於這個分配中已然預設的不平等，形成此種發話位置可能造就感知秩序重分配的空隙。

如若德希達式的政治幽靈，其所招喚的幽靈與政治行動，在目前的現實中普遍具有一種倫理的危險，陷入了洪席耶對於「他者化操作與代理無分者發言（使其斬斷與政治的連結，成為失語者）」的批判及

問題當中。那麼，「非分之分」藉由生命決斷／生命傷亡的手段，來進行的抗爭本身所內建的幽靈機制，除了因為啟動一種永無止盡的爭端（循環，不是一種招喚）而形成的「恐怖的政治（潛能）」之外；還可能以一種政治自身的幽靈出現，以反人道、非人權、無道德的方式，展露一種無形的、不須要代理者的特殊言說位置，並弔詭的閃現某種瞬息的平等。若「無分之分」有助於我們檢視一切社會事件、政治運動，用以判斷那些行動是偏向政於政治抑或是治安。那麼，「非分之分」則是逼使我們看見，甚麼是一種不想被算入，且無法計算，並使得理性計算邏輯被懸置的那個「非部分的部分」。

更重要的是，「非分之分」並沒有要脫離前述「政治」與「治安」相互共生的運作邏輯，而是在和共同體當中內置了一種具有永久性的不定時危險因素，反而加劇了衝突的形式，也更加惡化了原有「政治」與「治安」之間的共生關係。並隨著各自的話語理性和感性分享機制的不同，根本地擾動了原本對於誰才有自由、誰才有正義的爭端。

陸、餘論

本文主要是對當代法國思想家賈克·洪席耶政治思想的梳理，從洪席耶對「政治」與「治安」的區辨，以及在其「無分之分」的基礎上，提出「非分之分」的問題與爭議。意指那些在共同體內部被壓抑，又處於「無分之分」外部的一些無法被代言的聲音。接著以當前歐洲內部興起的恐怖攻擊為引，反思洪席耶政治哲學思想中政治、民主的盲域與界限。筆者所在意的並非是那些被標記為恐怖主義（terrorism）極端意識形態的組織或社群，及其所抱有的政治目標和理念。而是關注那些被統治者定調為「恐怖攻擊」的事件本身，其中對於話語邏輯的中斷、以及政治條件的生成，涉及到何種統治者理性計算能力所無法計算、造成的懸置和持續性失準，以及「非分者」如何以自我決斷維繫政治的強度，甚至在話語和噪音之間找到第三種發言管道的空隙。通過對於這些複雜細節與關係的考察，也許提供吾人思辨一種政治的強度時刻。

另一方面，則讓我們清楚地意識到，「政治的恐怖」恐怕不是在於對界限的追索和域外之處，亦不是對於民主體制的失落（disappointed）。而是在於對它的絕望（despair）。相對於「非分者」所展露出的絕望，筆者相信洪席耶與諸多的思想者，仍期盼「政治」能夠使人們更好的活著。並且，是以生命的存在為前提的這種理性而活著。然而，洪席耶式的「政治」，在「非分者」這裡似乎已經無法可能。如若「民主」就像洪席耶所述，這個詞本身即是一種對憎恨（hatred）與厭惡（abomination）的表達。又如果「非分者」並不是現行民主制度的產物，而是對於民主理念執行的不夠徹底所生成之物。那麼，此時此刻比起「非分者」對於民主的深仇大恨（ferocious hatred），我們可能對於「民主」仍然恨的不夠激進、也不夠徹底。

參考文獻

中文書目

- 江今葉，2014。〈歐洲各國憂青年成聖戰士〉，CNA 中央通訊社：
<https://www.cna.com.tw/news/newsworld/201407310008.aspx>。檢索
日期：2021 年 3 月 6 號。
- 朱元鴻，2004，〈碧落黃泉共同體，未應鑄成殘人間〉，《新聞學研究》，
第 78 期，頁 187-199。
- 洪世謙，2017，〈「我們是誰，誰是我們」的另徑詮釋〉，《國立政治大
學哲學報》，第 38 期，頁 159-196。
- 蔣洪生，2012，〈雅克·朗西埃的藝術體制和當代政治藝術觀〉，《文藝
理論研究》，第 33 期 2 卷，頁 97-106。
- 劉紀蕙，2020，《一分為二：現代中國政治思想的哲學考掘學》，台北：
聯經。
- 喬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賴守正譯注，2012，《情色論》，台
北：聯經出版社。
- 賈克·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劉紀蕙、林淑芬、陳克倫、薛熙平
譯，2011，《歧義：政治與哲學》，台北：麥田。

賈克·洪席耶 (Jacques Rancière), 李磊譯, 2016, 《對民主之恨》, 北京: 中央編譯社。

蒙特塞拉特·吉伯瑙 (Montserrat Guibernau), 周志杰譯, 2009, 《無國家民族與社群》, 台北: 偉伯文化出版社。

珊妲·慕孚 (Mouffe, Chantal), 周凡譯, 《論政治的本性》, 江蘇: 江蘇人民出版社。

讓·呂克·南希 (Jean-Luc Nancy), 郭建玲、張建華、夏可君譯, 2016, 《無用的共通體》, 河南: 河南大學出版社。

外文書目

Aidan Lewis, 2011/05/12. *Osama Bin Laden: Legality of killing questioned*. BBC News : <https://www.bbc.com/news/world-south-asia-13318372>. 檢索日期: 2021 年 3 月 6 號。

Bérénice Boutin, 2016. *The Foreign Fighters Phenomen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Hague :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Counter-Terrorism (ICCT) .

Geoffrey Robertson, 2011/05/04. *The point is, bin Laden should have been captured*. *The Belfast Telegraph*. THE HILL : <https://www.belfasttelegraph.co.uk/opinion/news-analysis/the-point-is-bin-laden-should-have-been-captured-28613278.html>. 檢索日期: 2021 年 3 月 6 號。

Jordy Yager, 2010/07/25. *Former intel chief: Homegrown terrorism is a 'devil of a problem'*. The Hill's Blog Briefing Room. Belfast Telegraph : <https://thehill.com/blogs/blog-briefing-room/news/110759-former-intel-chief-homegrown-terrorism-is-a-devil-of-a-problem>. 檢索日期: 2021 年 3 月 6 號。

Jacques Rancière, 1995. *La méésentente: Politique et philosophie*. Paris : Galilee.

Jacques Rancière, 1999. *Disagreement: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J. Rose,

Trans.)

Minneapolis, MN :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Jacques Rancière, 2004. *The Politics of Aesthetics: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 (Rockhill, Gabriel, Trans.) London : Continuum.

Jacques Rancière, 2005. *La haine de la démocratie*. Paris : La Fabrique.

Jacques Rancière, 2006. *Hatred of Democracy*. (Corcoran, Steven, Trans.) .
London : Verso

Jacques Rancière, 2009. *Et tant pis pour les gens fatigues*. Paris: Editions
Amsterdam.

Jacques Rancière, 2010. *Dissensus: On Politics and Aesthetics* (S. Corcoran,
Trans.). New York, NY: Continuum.

初稿收件：2021 年 10 月 05 日 審查通過：2022 年 01 月 10 日

作者介紹：國立台北藝術大學美術學系藝術批判與實踐研究博士生

通訊地址：桃園市中壢區民族路六段 12 號

電子郵箱：tyshells@yahoo.com.tw